



红色收藏



山西省城建档案馆收藏的兴国寺建筑图档

英雄热血洒古寺


张兵

兴国寺位于大同市平城区小西门街南端。据《大同县志》卷五记载,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曾经是明代大同地区的重要寺院,建筑宏伟,规模颇大,系国保单位。


兴国寺坐西朝东,正殿为上下二层建筑,下层为砖券窑洞三孔,外券为仿木结构,窑前设有长廊。上层为木结构,面阔三间,进深四椽,重檐九脊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覆顶。四周环廊,柱头和平身科木雕异形拱装饰,单步梁出头与廊柱相交,雕作卷云头,明、次间施格扇门窗。兴国寺正殿这种一层为砖券窑洞、二层为木结构的歇山顶建筑在大同地区极为少见,反映了明代雁北地区建筑的典型风格与技术水平,具有较高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正殿为明代遗构,在形制特征、建筑材料和建造工艺等方面保留了历史原状,具有鲜明的大同地方特色,反映着明代历史活动信息。

兴国寺还是革命烈士舒宏的牺牲地。舒宏,原名赵佩璧,山西忻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开始即献身于救亡事业,曾任晋察冀军区某团政委,1944年春调任中共雁北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为开展雁北革命工作作出很大的贡献。1945年10月,舒宏在大同城东40千米处的浅井村开会时,被敌军包围,被捕后关押在大同特警队。面对敌人利诱重刑,他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关押期间,他组织成立了狱中共产党支部,领导难友与敌斗争。1946年1月,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署后,军调小组进驻大同,中共代表提出释放狱中政治犯,阎军恐慌,遂于3月24日晚,将舒宏等14位革命同志押赴大同城小西门外的兴国寺门前杀害。

作为烈士牺牲地,古老的兴国寺成为研究红色文化的重要实物依据、开展红色教育的重要阵地,发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红色文化精神、坚定新时代理想信念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



汉画精粹(12)



拓片局部

惩恶扬善

李国新

这块来自山东喻屯的汉画像石由六组图像组成。

第一组表现的是雷公击鼓成雷、捕捉毒蛇的情景。雷公体型硕大,状如袒胸力士。他左手执锤,右手抓住毒蛇七寸,充满惩恶的英雄主义色彩。

雷公打雷用的“五连鼓”围着一只“蟾”,状如五星。五鼓之间有五条鱼间隔。鼓为阳,蟾和鱼为阴,说明风雷激荡之即,也是阴阳激烈冲突之时——这组图像周围布满阴线刻的云气,也正是在烘托云雷激荡的气氛。

画面下部表现的是惩恶之后,善良的人轻松自在地享受着美好生活。

由于雷公的正义之举,天上人间呈现出祥瑞气象——第二至第五组图案分别表现的是,玄武神驮着一对夫妻畅游,为人间送吉祥;一位羽人给一头驮人的鹿喂食仙丹;白虎神、青龙神驮人畅游……这些图案都在阐述着一个道理——行善必有好报。

这些具有浓郁神话色彩的画面,是在惩恶扬善。在古人的观念中,雷公承担着除恶的职责,人们相信,做了忤逆不孝等坏事,就会被雷公抓去,这是古人劝善的另一种方式。

“汉画精粹”栏目本期结束,感谢读者的关注。

——编者

山西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中,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与夏县师村遗址入围终评项目。本版编发两文,带您一探究竟。

白鹅引吭 族属浮现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经过持续发掘,众多出土器物填补了史料空白,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珍贵资料。

2020年4月起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垣曲市县文物部门对墓地展开了全面考古工作。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墓地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共勘探出墓葬217座、车马坑5座、灰坑241座、陶窑2座,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墓葬、灰坑和车马坑。

近两年,共发掘出墓葬39座、灰坑42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陶窑2座。通过连续的考古工作,对墓地的布局 and 性质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

墓葬整体分布较为稀疏,大、中型墓葬集中于墓地东南部,大型墓葬东南方有南北向车马坑陪葬,车在南,马在北,分开埋葬,也有单独马坑陪葬。墓地还有使用玉圭、玉璧进行墓葬的遗存。

从青铜簋到燕姬甗,众多出土器物填补了史料的空白。继出土先秦果酒填补相关研究空白之后,发现的一处春秋贵族夫妻异穴合葬墓,随葬人有大量青铜礼器和玉器,共出土各类文物约550组3500余件,出土铜器组合为七鼎六簋,达到了诸侯的级别,说明墓地人群的高等级和政治地位的重要。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或为燕姬和她的丈夫,两座墓葬的发现,为研究春秋早期贵族丧葬习俗、判断墓地族属提供重要依据。

玉器以墓主人随身敛玉为主,还伴出有齐家文化和商代玉器,少见陶器。多学科合作下,清理出漆鼓、人面漆器、绳竹皮革等珍贵有机质文物;铜盒中检测出春秋时期最早的化妆品残留物;铜壶液体证实了东亚最早的果酒。



北白鹅墓地墓葬使用的玉圭、玉璧



北白鹅墓地铜壶及酒残留物

当螺祖传说照进现实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年分析,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900至6500年。

此前,在运城盆地尚未系统发掘过仰韶时代早期遗存。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的发掘,填补了运城盆地腹地仰韶时代遗存发现的空白。仰韶时代早期,运城盆地处于黄河流域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的强势影响形成的漩涡之中,激发了师村遗址土著文化的发展机制,呈现出多元的、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从而向西阴文化转化。

这成为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的文化背景。

聚落:揭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重要聚落遗址

师村遗址的主要遗存为运城盆地仰韶时代早期的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师村遗址仰韶早期聚落被土围墙(Q1、Q2)环绕,墙外侧有台基等附属设施,围墙和台基外围有环壕。围墙内有房址和陶窑,围墙内外发现有墓葬和大量灰坑。

围墙形制规整,存在基槽,为人工挖槽填筑而成。

发现了仰韶时代早期结构最完整的陶窑。

陶窑(Y6)是在断崖上横向掏出窑室和火膛而成,有窑室火眼、火膛、火门等结构。窑壁内侧有青色烧结面,故该窑可能使用时间较长且窑内烧造温度较高。

师村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了仰韶早期重要聚落的变迁。Q1起建于聚落形成之时,一号、二号房址是聚落内最早的居址,居址边有陶窑,挖有排水沟,出现了灰坑等遗迹。继而修建的五号、六号台基成为了更多地面式的房址的基础,房址周边发现有瓮棺葬,聚落内可能用于排送水的灰沟不断增多。后来,在聚落外围挖掘出了环壕,同时,在Q1的外围起建Q2,并依托Q2修建起四号台基,围墙内外均发现有墓葬。

生产:探讨黄河中游仰韶时代早期先民生产方式的重要线索

古环境分析显示,仰韶时代早期师村遗址的植被类型为森林草原,气候温暖湿润。遗址出土了蚌簠、石臼、石杵等收割与加工谷物的工具。可见,当时农业已有了初步发展。出土石球等遗物表明,狩猎采集或为生活物资的补充。

师村遗址出土了6枚仰韶早期的石制和陶制蚕蛹,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如石雕蚕蛹,采用中条山地产的鲕状灰岩制成,使用螺旋状的弦纹,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



师村遗址出土石制与陶制蚕蛹



「运城垣曲」
北白鹅
两周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文物保护中心 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

垣曲北白鹅墓地宣传海报

管诉事和段八师的官员,为了感谢周天子,他做了这些青铜器。与此同时,“夺”还感谢了自己的祖先“中氏”和自己的父亲。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项目负责人杨及耘表示,根据铜器铭文推断,这是“太保匭仲氏”在成周采邑内的家族墓地,也是除了虢、芮之外,经考古发掘实证的另一处畿内“王卿采邑”,扮演着把控制矿资源,扼守机关要道,以藩屏周的京畿锁钥的重要角色。“太保匭仲氏”中的“匭”即“燕”。

垣曲北白鹅墓地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型墓地,为研究两周时期的葬俗、宗法、采邑制度、文化交流以及政治格局演进等都提供了珍贵资料,对探讨黄河文明,探索晋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实证中华文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新时代考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创新一步。



山西夏县师村遗址
中国最早的石雕蚕蛹
丝绸之畔的仰韶早期聚落

发掘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项目负责人:段天璠

当螺祖传说照进现实

夏县师村遗址宣传海报

尾部,酷似家桑蚕。形态逼真、造型精美、工艺成熟,引人注目。

运城地区有“黄帝正妃螺祖养蚕缫丝”的传说。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掘出半粒碳化的蚕茧,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但难以确指其年代。

经实验室测试鉴定,师村遗址仰韶早期遗存中发现了一定比例的桑科花粉,很可能与先民们养蚕缫丝相关。同时,还发现了碳化黍和粟的种子。

师村遗址石雕蚕蛹意味着,距今6000年以前,黄河中游的先民们崇尚桑蚕,很可能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为我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夏县师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灿烂成就与重大贡献。

本组稿件据国家文物局官网杨及耘、段天璠等专家文章综合整理

太山龙泉寺唐碑

太山龙泉寺正院建筑布局紧凑灵巧,院内存有历代碑碣数通。其中,东北隅立有唐碑一通,为唐景云二年(711)所立。碑通高6米、宽1.5米、厚40厘米,碑额盘龙戏珠,龙体交错,刀法洗练明快,气质淳朴浑厚,下乘赑屃,具有典型的初唐风格。赑屃又名龟趺,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为龙生九子之第六子。

这通唐碑是目前全国发现的继乾陵武则天无字碑、西安碑林唐玄宗孝经碑之后的唐代又一大碑。现今该碑地上部分存3.8米、地下掩埋2.2米,应为原寺庙塌毁后所埋没,碑文历经1300多年已漫漶难辨;碑阴未发现碑文残存,但碑阳下半部分尚有一部分碑文保留,文字大概

为20毫米见方的阴刻笔体,笔画深度约0.1毫米~0.3毫米。借助专业仪器对其进行检测和识别,碑阳所辨出文字基本上是对武则天主要生平业绩的记载和颂扬,如与唐高宗李治并坐明堂,共治天下;大兴科举,压抑豪族;门庭举衣,奖掖庶族;金轮之化,降抚铜雀;遵顺天意,还政李唐等。碑刻文字中,仍然使用武则天所造新字若干。

武则天造字多是以繁代简,把原来已有字的字形加以改变,但在武则天看来,则是夸耀她的高明、伟大、博学、睿智,也是表达她皇统万年、长治久安心愿的一种手段。

有唐一代,随着碑文化的兴盛繁荣和人们对立碑一事的高度重视,对碑的使

用形成了一定的等级规定。《通典》卷一百零八和《唐会要》卷三十八记载,唐时朝廷对不同等级的人使用墓碑的规格有详细规定。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碑碣题字,碑各部的尺寸、形式、花纹图案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并形诸法律条文。《唐六典》卷四载,五品以上官员立碑“龟趺螭首”,高不得超过九尺;七品以上官员立碑“圭首方趺”,高为四尺。“若隐论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

此碑规制奇特,饱经沧桑,足以见证龙泉寺时代之久远、规模之宏大、地位之崇高。

(本文选自太原市文物局编著《听得见的博物馆》)

